

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邵燕祥题

XUEXI
MAKESIZHUYI
XINWENGUAN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任：郑梦熊

副主任：栗国安 梁贵和

编 委：王大龙 汤李梁
全军会

编 辑：全军会 阚敬侠
苏 娟 沈毅兵

编者的话

2000年4月24日起，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分期分批举办研讨班，组织采编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随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在全市新闻单位广泛开展此项学习活动。2001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强调今年要进一步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抓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职业道德两项教育活动。2月27日，中国记协在京召开了全国新闻界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座谈会。随后，中国记协向各地方记协、专业记协和各会员单位发出了《关于推动新闻界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意见》发出后，各新闻单位希望中国记协能够提供相关学习参考材料，我们随即编辑了本书。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加之时间紧迫，本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热诚欢迎广大新闻工作者批评指正。

2001年5月 编者

目 录

上篇 领袖论述

《马克思致阿·卢格》	
(马克思 1842 年)	(3)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恩格斯 1847 年)	(5)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恩格斯 1848 年)	(26)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	
(马克思 1870 年)	(36)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恩格斯 1884 年)	(41)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宁 1905 年)	(44)
《论口号》	
(列宁 1917 年)	(49)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责任》	
(列宁 1918 年)	(57)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列宁 1918 年)	(63)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列宁 1918 年)	(93)
《论“民主”和专政》 (列宁 1919 年)	(96)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列宁 1919 年)	(101)
《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毛泽东 1938 年)	(139)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 (毛泽东 1940 年)	(141)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 1941 年)	(143)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 (毛泽东 1942 年)	(152)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 1942 年)	(154)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毛泽东 1944 年)	(170)
《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毛泽东 1945 年)	(175)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 1948 年)	(178)
《要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 (毛泽东 1953 年)	(183)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 (毛泽东 1954 年)	(185)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 (毛泽东 1957 年)	(186)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毛泽东 1957 年)	(187)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57 年)	(193)
《记者头脑要冷静》 (毛泽东 1958 年)	(209)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毛泽东 1958 年)	(211)
《要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 1959 年)	(212)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 (毛泽东 1964 年)	(214)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邓小平 1950 年)	(216)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1977 年)	(222)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 1979 年)	(228)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邓小平 1980 年)	(244)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邓小平 1980 年)	(251)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邓小平 1981年)	(284)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邓小平 1981年)	(288)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邓小平 1983年)	(293)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邓小平 1985年)	(306)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 1986年)	(309)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邓小平 1992年)	(313)
《邓小平各时期新闻宣传摘录》 (邓小平)	(327)
《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 1989年)	(348)
《在视察新华社时的讲话》 (江泽民 1991年)	(360)
《宣传思想战线是我们党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 ——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 1993年)	(363)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江泽民 1994年)	(371)
《充分发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政治优势 努力为改革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同志座谈时的讲话 (江泽民 1995年)	(386)

《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江泽民 1996 年)	(390)
《关于讲政治》 (江泽民 1996 年)	(395)
《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 (江泽民 1996 年)	(401)
《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 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407)

下篇 学习文章

《关于推动新闻界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 (中国记协发〔2001〕8号)	(417)
《关于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通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421)
《坚持正确导向 全面提高素质》 ——学习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讲话 (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 徐光春)	(424)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努力提高新闻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 (中宣部副部长 王晨)	(437)
《努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党报新闻工作者队伍》 (人民日报社社长 邵华泽)	(442)

《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在新华社编务会议上的讲话

(新华社总编辑 南振中) (449)

《就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谈几点认识》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张研农) (460)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武装队伍》

(经济日报总编辑 冯并) (466)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几个问题的思考》

(新华社副社长、常务副副总编辑 马胜荣) (469)

《植根实践土壤 理论之树常青》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何东平) (476)

《关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北京日报社社长 满运来) (480)

《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陆炳炎) (489)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高舆论引导的自觉性》

(上海电视台副台长 张延平) (496)

《树立正确的新闻观 把好导向推进改革》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范以锦) (510)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学习江泽民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

(《新闻战线》特约评论员) (521)

《端正新闻观 辨识正与误》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文有仁) (534)

上篇
领袖论述

马克思致阿·卢格

马克思

[1842年] 11月30日于科隆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有关的“纠纷”。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 对您和海尔维格，(2) 对“自由人”，(3) 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对他们作品的缺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方面体现自由，而更多地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方面体现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

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像一个小孩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恩格斯
[1847年]

[第一篇]

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驳编辑部的无谓指责、为自己进行辩护为借口，大张旗鼓地开始同共产主义者论战。

编辑部建议双方不要进行论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来只应发表海因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即确实是对指责他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加以反驳、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那一部分内容。即使“海因岑没有一份可供自己支配的报纸”，这也不能成为理由，说明应当提供一份报纸供他支配，让他发表连该报编辑部自己都认为是无聊的攻击性的东西。

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倒是向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帮助。过去任何一个党派所受到的责难，都没有像海因岑在这篇文章中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这样荒唐和狭隘。这篇

文章最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是正确的。它证明，如果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抨击过海因岑，那么，现在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了。

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以一个党同另一个党争论的方式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他“有权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必须估计到”共产主义者会做些什么，“必须要求他们”做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说话。

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他在 1844 年还如痴如醉地向往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在私下小心翼翼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也许是值得向往而又能实现的。但是，海因岑先生认为在普鲁士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连雅科布·费奈迭在多年以前写的本论述普鲁士的著作都比他的好得多）而不得不逃亡在外。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宣称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了革命家，当然也变成了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严肃的学者卢格；后者向他传授了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哲学，这种哲学是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关于人的学说、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这一套东西之后，便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他右靠卢格，左靠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疯狂

的激进主义。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进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一旦他不可能再进行合法斗争，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而不考虑德国资产阶级目前还完全有可能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斗争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他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他就宣称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去研究并从总体上把握德国的情况，由此推断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以及什么样的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去弄清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确定应当遵循的政策，总之，他不是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进程适应他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而一旦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懦夫和雇佣文人的避难所，海因岑先生便不幸地同它合流了。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那个毕生都只充当改宗者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惟一在他的劝诱下改变信仰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肯定会使卢格先生得到安慰，因为至少有一个人自认为领会了卢格先生空洞言论的奥义。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美国的传统和1793年的传统以及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德国由于本国工业委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以致它永远不可能发挥首倡精神，永远不可能首先宣布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国和英国而独立自主地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脱离文明各

国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据称要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按照海因岑先生的主张将完全对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置之不顾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学说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即将出现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幻想，难道都要德国人去实现吗？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一切灾难的祸首。这种论断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庸碌无能、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谀谄媚，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无限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既然断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灾祸，那他同时也就承认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样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应当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毫无意义的、盲目进行的宣传难道不是极其严重地损害着德国民主派的利益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动荡时期即30年代，德国境内没有散发过